

主 编 陈金钊
副 主 编 左 峰 吴文新

黄海学术论坛

HUANGHAI XUESHU LUNTAN

第十七辑



上海三联书店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主办

主 编 陈金钊
副 主 编 左 峰 吴文新
执行主编 吴文新

黄海学术论坛

HUANGHAI XUESHU LUNTAN

第十七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海学术论坛.第17辑 / 陈金钊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12

ISBN 978-7-5426-3714-7

I. ①黄…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3166 号

黄海学术论坛(第十七辑)

主 编 / 陈金钊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00)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号楼10楼

邮购电话 / 24175963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

版 次 /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80千字

印 张 / 2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714-7/C·410

定 价 / 45.00元

目 录

“全球交往中的中国文论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

“全球交往中的中国文论建设”学术会议综述	泓 峻(1)
论“诗文评”	杜书瀛(5)
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与发展之路	毛崇杰(28)
中国古代的哲学智慧与诗学追求	彭亚非(44)
作为公共性书写的文化批评	
——以我的博客写作为例	陶东风(61)
走出民族政治:全球时代与汉语文论别议	邓军海(67)
21 世纪以来艺术生产论在中国的新拓展	陈奇佳(80)
从革命的形式到文本科学的建立	
——20 世纪中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走向 ...	董希文(102)
从机械反映论到实践论	
——《手稿》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哲学基础 ...	周维山(110)
浮出历史地表的爱情	
——《伤逝》之后	何 浩(121)

东北亚研究

被告别,被遗弃,被背叛的

——郑律成与 20 世纪抗日战争中的国际主义精神 …	靳大成(130)
百年来朝韩对于中国文论的接受与研究 ……………	刘顺利(137)
韩国大学名称分类和专业设置 ……………	高绍山 郑 丽(144)
论市民社会与韩国民主政治发展 ……………	杨鲁慧 马迎凤(164)
问题与改良:民国时期的乡村文化危机与 改良运动 ……………	蒋树鑫(178)

语言文学艺术研究

试演“译经”后天八卦 ……………	孙迎春 周朝伟(186)
宋代旧形单音新词词音、词义联系探讨 ……………	孙晓玄(202)
国内外汉德语对比研究:现状与展望 ……………	黎东良 熊 燕(209)
空间焦虑 ——论贾樟柯的电影 ……………	李 平(226)
瞿秋白文艺大众化和金基镇 文学大众化论比较 ……………	李光在 刘洪军(238)
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问题与出路 ……………	张银堂(248)
探究中国学生在外语课堂特色表现的文化根源 ……………	邢路威(256)
从声乐作品的舞台诠释看二度创作 ……………	张海涛(262)

社会哲学与休闲研究

风险生存:马克思主义人学当代发展的崭新视域 ……………	贾英健(267)
当代发展研究中风险问题的理论自觉 ……………	何小勇(279)
从风险社会角度看科学发展观 ……………	关改红(290)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三种形式 ……………	林祥伟(299)
试论社会主义与休闲的历史关联 ……………	吴文新(309)

现实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探究	谢秀华(317)
山东省烟台市休闲组织发展个案研究	曹 红 刘爱静(325)

伦理道德研究

市场经济中的食品安全危机	
——经济伦理学的思考	田欣欣(340)
从康德绝对命令 II 看我国高校德育	
——以药家鑫案为例	段兰兰(347)
以麦金太尔的德性论看药家鑫案	李文静(354)
药家鑫杀人案的人性辨析	邵晓盼(360)

经济与管理研究

信息化条件下财务呈报框架的构建浅析	张志平(366)
分工经济思想的发展	
——从亚当·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	岳晓伟(372)
反腐败战略突破口的选择	
——一种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反思	李振东 孙阳阳(378)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	
困境分析及科技金融创新体系研究	李希欣(388)
山东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刘松松(399)
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本质分析	
——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	钱 雨(413)
高校图书馆:助贫育才两不误	
——基于勤工助学工作的思考	谷加恩(428)

“全球交往中的中国文论建设” 学术会议综述

泓 峻*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共同主办的“全球交往中的中国文论建设”学术研讨会于 2011 年 5 月 21—22 日在威海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副所长高建平,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副校长陈金钊在开幕式上致辞,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张红军主持开幕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出版机构的 40 余位学者,围绕中国文论建设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论题主要涉及:

第一,中国文论的特殊性及中西文论会通的可能性。杜书瀛回顾了中国的“诗文评”逐渐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和独立学科的过程,强调“诗文评”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迥异于西方的“文学批评”,二者似是而非。两者表面的差异背后,更有中西不同民族在哲学思想、思维方式等文化本性上的区别为其根由。彭亚非指出,在中国的哲学智慧中,任何层次的道都具有可说与不可说两个层面。形上本体的超言说性使中国古代智慧不重思想而重意识,不重言说而重意会(心契),不重理念而重意境。中国诗学中对诗意最高境

* 作者简介:泓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界的追求,与这种哲学智慧的终极追求,一体相通。“境”实因诗象之美的所指沉寂、能指敞开而得之,由是而成为中国诗学中一个具有终极性追问性质的核心概念。

在一些学者强调中西文论差异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着眼于中西文论的会通的可能性及其途径。程相占认为,可以借鉴成中英提出的“本体诠释学”思想,从辨析中外本体论的差异着手,来分析中外美学概念的异同及其融通的可能性,从而构建解释能力更强的美学概念。胡志明用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提出的“块茎”(Rhizome)概念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了阐释,认为《二十四诗品》的形貌特征及其运思形状与“块茎”式的文本和思维形态多有契合之处。这一契合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不少学者关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向东方艺术靠拢的观点。中国古代文论经典丰富地蕴含着可以培植孕育生活诗性的基因,有可能借助于后现代文化批评的理论而获得再生。毛崇杰则认为,一个时期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与发展集中表达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以及中西文论怎样“对接”等话题,如此提出问题的方式仍然没有超离一个多世纪前中学与西学的“体用”之争的框架。后现代语境既给了中国文论走出自身封闭性历史的机遇,又在新一轮“西学东渐”语境下带来“失语”与“知识合法性”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求生存与发展必须超越中心主义的“体用”框架进入多元对话平台,在新语境下重新体系化,以同等地位和资格与西方文论体系平等对话。

第二,百年来中西方文论交往的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高建平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文论界对西方文论翻译形成过三次高潮,每次都各有其特点与独特贡献。上世纪50年代的翻译活动以俄苏文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的古希腊与德国古典文论为主要内容,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文论界抱着强烈的“向国外学习”的心态,突破了50年代的局限,以几个影响巨大的译丛为代表的翻译对西方20世纪文论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在许多领域有开拓之功。近20年来国内研究者往往从自己的研究需要出发,形成了不同的主题,更加多元化,而且建立在与国外文论界充分对话的基础上,使中国文论翻译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张静静在发言中对1990年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进行了回顾,认为此时随着理论语境与现实语境的变迁,

中国文论在引入西方文论时,呈现出多元共生、对话交流、反思批判的新特点。泓峻以胡适白话文学理论的形成及近年来一种胡适研究视角为例,分析了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两种误读方式及其接受效果,认为一些学者在讨论20世纪初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历史过程及胡适“一班人”的贡献时,受西方学者解读西方近代语言变革历史时所使用的“语文政治学”研究视角启发而得出的结论,偏离了中国历史真相。相对于胡适因无法忘掉中国自身的问题而误读西方文艺复兴史而言,这种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误读,更加值得反思。

第三,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丁国旗比较了在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时马克思与歌德的差异,并提出要注意列宁、斯大林对“国际文化”、“无产阶级文化”等概念的讨论与“世界文学”的某种关联,冷静地分析对待当下由“全球化”思潮所引起的“世界文学”研究热。董希文探讨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的走向,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力求辩证处理形式创新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寻求两者的平衡协调发展。但相较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更关心形式革新所具有的革命功能,以伊格尔顿为核心的诸理论家则更倾心于文艺审美意识形态的发生学原理,力图科学地阐释审美意识形态生产机制。进入21世纪,更为综合的文本文化修辞研究将成为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发展的主流。陈奇佳回顾了21世纪以来艺术生产论在中国的新拓展,认为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在成为新的生长点,取得令人瞩目成果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需要提升或改进的方面。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借用精神生产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深化艺术生产论的内涵,同时要注意艺术生产论只是研究的视角之一,我们有必要对此种研究方式自身的局限性、它与文学艺术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

第四,文化批评及文学研究的政治向度。陶东风认为,在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家族中,最能够体现公共性的文体和书写形式就是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基本上属于政论文体,往往能够及时抓住当下文化中的各种公共议题,迅速作出理性但不乏尖锐的评论,以便影响公众舆论。1990年代以降,作为公共性写作的文化批评在中国非常流行,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话题。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批评而言,网络空间(比如博客)显得比纸媒体更为重要,公共性的博客写作,最能够体现文

化批评的对话性和互动性。徐贲在发言中介绍了英国作家奥威尔的文学、文化批评,认为奥威尔的文学思想是人们了解和研究1930、1940年代英国和欧洲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倾向和特点的重要第一手材料。中国读者可以用他来做一个特定的西方知识分子案例,增进对六七十年前西方文论的了解。郭建对西方某些极左学者的“中国情结”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从批判自身资本主义社会立场出发,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文革”当成一个美丽的幻象,回避了真实的历史。

范玉刚“从文艺的政治向度看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为题的发言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文学开始分化、文学研究范式开始转型,逐渐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如何在复杂的文化境遇中重构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一个新课题,而凸显文学研究的政治向度,结合党史研究,可以为当下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提供借鉴。邓军海则对大多数关于全球化与中国文论关系的讨论表现出的民族政治倾向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认为汉语文论建构要落到实处,而不是流于号召,首先要做的是走出民族政治,回到理论本身。陆建德在相关单元的点评中则强调,超越时代的审美态度是值得怀疑的,即使中国古代文士追求的“林泉之心”,背后也有很多潜在的话语,它是一个文人进入上层社会的一种姿态与标志。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强势话语,艺术研究要在美的历史性、社会性与美的绝对性、超越性之间取得平衡。有些人虽在字面上回避文学的政治向度,但其阐释的方向仍可能是以政治为主的。文学不等同于政治,但许多方面确实与政治有关。即使是艾略特那样的现代主义者,阿伦特那样自称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一旦涉及情感、信仰等论题,也会表现出许多奇怪的变化与悖论。

会议还涉及其他一些相关话题,比如刘顺利对百年来朝韩对于中国文论的接受与研究进行了探讨,靳大成以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国生活过的朝鲜音乐家郑律成为例,分析了当传统社会的朝贡、册封体系被近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与殖民地体系取代后,传统的民族、地域、文化因素被重新以现代的形式组织进反抗近代帝国主义殖民战争的历史洪流中时,由此出现的在中国大陆和亚洲各国你中有我,不分你我的共同抵抗战斗的格局。

本次会议论题集中,发言有着激烈的碰撞与交锋,讨论热烈,促进了与会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论“诗文评”

杜书瀛*

一、“诗文评”由来

“诗文评”本是古籍目录学术语,是中国古代书籍分类时所使用的一个名称。

古籍分类,在中国最常见的是“经”“史”“子”“集”四部,下面再分不同类别。有一类书,像《文心雕龙》、《诗品》等谈论诗文的著作,放在哪里、取个什么名称呢?在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和图书分类史上,很长时间里这些作品没有独立地位;它们的“分立”史和“独立”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们“《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1]。查《隋书》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经籍四》之“总集”中,列有“《文心雕龙》十卷”和“《诗评》三卷”,与它们同列为“总集”之内的有挚虞《文章流别集》、昭明太子《文选》以及大量的“诗集”、“赋集”、“文苑”等文学作品集。《隋书》是唐初魏征等人所撰。显然,到唐代初年,《文心雕龙》和《诗品》等淹没于当时被称为“总集”的许多作品的“芸芸众生”之中,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挑出这些评文评诗的文字而单列一类。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集部”末尾部分,列有《文心雕龙》,也将其混于“集部”之中而并没有给予独立地位。因此,至少到五代后晋时还不能说这些评诗评文的作品已经“别立此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语名不副实)。北宋王尧臣等编的《崇文总目》^[2]进了一步,在“集部”中别立“文史”一类,将《文心雕龙》、

* 作者简介:杜书瀛,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文艺学、文艺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研究。

《诗品》等放入其中;至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在“文类”下分立“文史”与“诗评”两小类,分别列入《文心雕龙》和《诗品》。到宋代总算是单独为评诗评文的作品留出一片小小的天地。然而,上述“志”书,都没有把评文的《文心雕龙》和评诗的《诗品》等论著合起来列为一类给一个名副其实的专有名字。直到明代,著名学者焦竑^[3]在万历年间撰写的《国史经籍志》^[4]中,才给《文心雕龙》、《诗品》这类书取了一个独立的名称“诗文评”,但仍作为附录放在“集”部里。这大概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出现“诗文评”三个字连在一起而组合成的名称。至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把“诗文评”放在“集”部之下单独列为一类,成为“集”部的正式成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对焦竑《国史经籍志》颇有微词,说它“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乱载,古来目录唯是书最不足信”;但焦竑所使用的“诗文评”名称和图书类别不但延用下来,而且地位有所提升——“诗文评”类著作才算真正从“附庸”走向“独立”,“诗文评”的称谓也被广泛使用而通行开来。

“诗文评”在《四库全书》中共有三卷,即“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诗文评类一”,“卷一百九十六·集部四十九·诗文评类二”,“卷一百九十七·集部五十·诗文评类存目”。

二、“诗文评”作为中国古代评文说诗的特殊学问或学科

作为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艺学的研究者,我们更加看重的不是“诗文评”在古籍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的意义,而是它对中国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艺学的价值——当“诗文评”在图书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独立之后,这类著作也顺理成章被正式视为中国古代一门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

从上述目录学和分类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略见“诗文评”之逐渐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和独立学科的端倪。

魏晋之前,并没有专门的诗文评论著作,那些评文说诗的文字散见于其他著作和言论之中,譬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今文《尚书·尧典》(古文《尚书·舜典》)中的“诗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乐,《论语》中谈诗之“兴观群怨”、“思无邪”,《孟子》中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以及淮南王刘安、司马迁、扬雄、王充、王逸等在他们著作中对于诗文和作者的议论,

等等。那时既然没有专门的诗文评论著作，也就根本说不上评论诗文的专门学问和独立学科。

到魏晋南北朝，专门评论诗文的文章和著作才开始出现；并且在之后的隋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逐步发展、繁荣，蔚为大观。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的撰写人主要是清代中期大学者纪晓岚）“诗文评”类小叙所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棻《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1]这段文字中有一句话要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即：“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所谓“论文之说”，就是评论诗文的学问或学科；因此“论文之说出焉”即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断定在这一时期（“建安黄初”）这门学问或学科正式诞生了。这篇小叙大体描述了评文说诗一些标志性论著和它们所代表的这门学问或学科（所谓“论文之说”）的主要内容及其诞生、成长、走向繁荣的过程，言简意赅，语不虚发，脉络分明。它也可以被视为这门学问或学科最早的一部简史。我们不能不佩服《提要》作者的学识和目光。但是这段话也有不足之处，即关于这门学问或学科如何从其他学问或学科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脚步，它并没有给予特别清晰的说明，只是笼统说“《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今天，我们可以比较仔细地考察这门学问或学科从起步、发展到成熟和繁荣的历程。

如上所述，评论诗文的学问或学科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诞生，即所谓“论文之说出焉”。在我们今天看来，它说的确实是一个事实：已经存在的那么多评文说诗的专门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等，完全可以证明古代文论这门特殊学问和学科已经建立，而且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度，取得重要成就。但是，直到唐和五代，它的学科地位却没有得到历史的相应承认——所

谓“《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角度加以解读，是说至少在唐朝甚至五代，评论诗文的这门学问的独立性，尚未得到历史的普遍认可；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它只是一种“附庸”而已。

唐朝和五代之后，评论诗文的著作在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列出“文史”和“诗评”两小类，“别立此门”。这其实反映了“学科”意识和认识上的变化：所谓“别立此门”，从“学科”意义上看，即它作为评论诗文的一种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得到学界确认，因而也就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更好环境和条件。历史事实也证明，古代文论在宋代获得了重大发展——两宋是我国古代文论空前繁荣的时期，是魏晋之后的又一个高峰；虽然当时它还没有确立一个恰切的学科称谓，但是离这一刻已经不远了，这个学科的名称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

果然，至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终于在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给它一个“诗文评”的类别称呼；而从学科发展史的意义上说，也就意味着获得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科名称，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历史事实上看，明代“诗文评”在各个方面都获得巨大发展，且有新的创造和突破。

而到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诗文评”在目录学和分类学上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类别，而从学科和整个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也即表明它作为一门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的名称得到文化界、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认可。至此，“诗文评”这门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名至实归，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地存在于世，并在历史的、文化的、学科自身的各种力量的推波助澜之下，大行其道，走向繁荣，走向它的“集大成”（郭绍虞语）时代。

三、“诗文评”成为一门独立学问或学科的依据

从上文，读者会看到：我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小叙所说“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一语中的“论文之说”，认作是它对中国古代一门特殊学问“诗文评”学科的最初表述；而“故论文之说出焉”，则是断定这门学科在“建安黄初”时的诞生——虽然当时尚无“诗文评”之名称，但事实上这门学科确实在那时已经诞生，并且在之后千余年间的进程历程中得到正式命名，逐渐发展繁荣。

也许有人会说：你如此称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判断，认定“诗文评”作为中国古代一门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诞生于魏晋南北朝并在后来千余年发展繁荣、蔚为大观，依据何在？

依学术惯例，一门学问或一个学科能否成立，第一要看它有没有自己特殊的、独立的对象和论述的特定内容；第二看它有没有自己特定的术语（范畴、概念）和相对固定的语码系统；第三看它在自身领域里有没有足够量的从事者、足够量的学术实践活动以及足够量的著作产生。这三条，应该可以看作是某个学科能够成立的标志。

请读者朋友与我一同逐条分析、验证。

第一条，“论文之说”（也即后来获正式命名的“诗文评”）的各种著作有没有自己特殊的、独立的对象和论述的特定内容呢？事实证明，有。譬如，它之所以被认定诞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因为当时“论文之说”的各种著作，既有明确的论述对象又有自己特定的论述内容：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佚文片段）、刘勰《文心雕龙》等，论述的对象就是“文”，论述的内容包括文的根源、文体、文的创作、文的鉴赏等种种问题，特别是“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心雕龙》对上述各个方面都作了全面辨证、深入考察和详尽论说，达到当时学术上的最高水平，把它拿到世界上去，都可认作是一部成熟的文论著作。《诗品》则专论诗（特别是五言诗）的种种问题，凡是接触《诗品》这部著作的人，一看便知，不言自明。此后千余年来的评文说诗的文章和著作，如唐代杜甫《戏为六绝句》和白居易《与元九书》，两宋以来以至明清时代的大量诗话、词话、文话（四六话）、曲话、小说和戏曲评点等，也都不离诗、词、文、曲等专门对象和特定内容。前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小叙那段话中举出的“诗文评”之“五例”，即“总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棻《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已经概要说明了这些著作的论述对象和内容的特殊性和专门性，即对诗文及其作者进行所谓“究源流”、“评工拙”、“溯师承”、“陈法律”、“采故实”等等。总之，“诗文评”著作之所以被归为一个独立的类别而划分出来，就是因为这类著作与其他部门（譬如与“经部”、“史部”、“子部”等）和其他类型（譬如“集部”中之“别集”“总集”等）的著

作相比,有着不同的、属于它自己的特定对象、内容,它们是评说诗文的,用今天的学术术语,即它们的论说对象和内容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包括文学作品,它们的作者(文学家),它们的创作情况,以及与作品、作者、创作相关的林林总总各种问题。显然,从对象和内容看,它们与《易经》、《礼经》、《孝经》等类似于今天的“思想研究”、“伦理学”类著作不同,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类著作不同,与《孟子》、《庄子》、《韩非子》等类似于今天哲学类著作不同,与《诗三百》、《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今天所说的文学作品也不同。也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与“经”学、“史”学等不同的特殊学问;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说,它们已经成为与类似于现在所说的哲学、伦理学、历史学以及文学创作等不同的独立学科。

第二条,“论文之说”(“诗文评”)的各种著作有没有自己把握对象的特定术语(范畴、概念)和相对固定的语码系统呢?有。以《文心雕龙》为例。该著从《原道》起到《序志》止共五十篇、四万来字,使用的是与自己所论对象和内容相应的特定术语和语码系统,而同其他学科用语明显不同。譬如《神思》篇谈文之写作中的想象问题,就用了“神思”这个术语,所谓“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用“神思”这一术语可以恰切表述作家想象之性状。《体性》篇谈作者的才情用了“才”、“气”、“学”、“习”等几个术语,谈文章的体性风貌用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术语,并对它们的含义作了规定;后来又把每个术语各简化为一个字,分为四组,两相对照,说明它们之间的不同含义,所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风骨》篇用了“风”与“骨”两个术语(这两个字也可以连起来成为一个术语“风骨”),说“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界定其含义也独到而精妙。《乐府》篇用了“声”与“律”两个术语,所谓“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比兴》篇用了“比”与“兴”两个术语,所谓“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通变》篇用了“常”与“变”;《定势》篇用了“势”;《夸饰》篇用了“夸饰”;《隐秀》篇用了“隐”与“秀”;《总术》篇用了“文”与“笔”,等等。这些术语以及由它们所组成的语码系统,与“经部”“史部”“子部”以及“集部”其他类别著作的术语绝然不同。钟嵘《诗品》所用术语(范畴、概念)也有自己的专属性,如它的《序》之第一段话“气之

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中所用的“气”、“物”、“性情”、“舞咏”等几个术语;后面“理过其辞”中的“理”和“辞”,“建安风力”中的“风力”,五言“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中的“滋味”,“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中的“兴”、“比”、“赋”,“吟咏情性亦何贵乎用事……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中的“情性”、“用事”、“补假”、“直寻”……都是“诗品”这门学问或学科的特殊术语。而后来的“诗文评”著作,术语和语码系统更加丰富。有的是两相对应组成的一对一的术语,如:“美”与“刺”、“情”与“理”、“文”与“质”、“形”与“神”、“情”与“景”、“言”与“象”、“文”与“道”、“正”与“奇”、“华”与“实”、“虚”与“实”、“繁”与“简”、“工”与“拙”、“精”与“粗”、“避”与“犯”、“隔”与“不隔”、“纤秣”与“简古”、“绚烂”与“平淡”、“豪放”与“婉约”、“阳刚”与“阴柔”、“尖新”与“板腐”,等等。有的是由一个字、两个字或数个字组成的单个术语,如:“志”、“气”、“味”、“韵”,“清新”、“自然”、“雄浑”、“劲健”、“绮丽”、“洗练”、“含蓄”、“冲淡”、“兴象”、“意象”、“性灵”、“妙悟”、“兴趣”、“神韵”、“格调”、“风神”、“意境”,“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炼意”、“炼句”、“炼字”,“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小收煞”、“大收煞”、“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等等。以上这些术语(范畴、概念)和语码系统,只能用于“诗文评”而不能用于其他学科。

第三条,这门学问或学科有没有足够量的从事者和具体实践,特别是有没有足够量的著作呢?有。最简便的证明材料,莫过于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诗文评”类著作情况进行分析。其中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诗文评类一和卷一百九十六集部四十九诗文评类二共收“六十四部,七百三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卷一百九十七集部五十诗文评类存目又收“八十五部,五百二十四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两项合起来共一百四十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五卷。这么多的有名的(其中有许多影响深远)著作,这么多卓有成就的文论家和诗论家,这么长时间(一千多年)的学术实践,对于一个学科来说,足以证明它的实际存在和它的发展繁荣了。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到的,只是从魏晋南北朝《文心雕龙》起至清乾隆年间实际存在过的诗文评类著作及作者的一部分,它没有提到和没有收进去的还有很多。以魏晋南北朝时期著作而论,如曹植《与杨德祖书》,阮籍《乐论》和嵇康《声无哀乐论》(古代诗舞乐不分或联系十分紧密,因此乐论也涉及诗文),傅玄《连